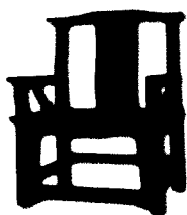


天地玄黄

飘逝的岁月
中国社会史



著者：曹文柱 赵世瑜 李少兵



A08779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史: 飘逝的岁月: 插图本 / 曹文柱等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9
ISBN 7-5617-2329-6

I. 中… II. 曹… III. 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0044号

参加本书策划、编审、出版工作的主要人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貽恩 陈长华 陈丽菲 高山 龚海燕 郭绍玲
黄惠敏 蒋克 李惠明 李慧耀 李瑾 毛静国
缪宏才 乔惠文 邱红穗 阮光页 王焰 王子奇
夏玮 朱杰人 张哲永 张德成

天地玄黄

飘逝的岁月

中国社会史

.....

著者	曹文柱 赵世瑜 李少兵	印刷者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总策划	朱杰人	开本	889 × 1194 16开
编辑统筹	陈丽菲 王焰	印张	15.75
组稿编辑	陈丽菲	字数	300千字
责任编辑	夏玮	版次	2001年9月第一版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印次	2001年9月第一次
封面装帧	高山	印数	3 500
版式策划	蒋克	书号	ISBN 7-5617-2329-6/K · 184
版式设计	黄惠敏	定价	130.00元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www.ecnupress.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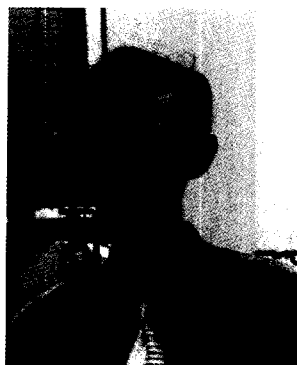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曹文柱，1945年生，北京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社会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治乱嬗替》、《胡汉分治》、《中国流民史》以及《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合作）、主编《中国古代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等。另发表中国古代史论文数十篇，散见于各类学术刊物。



赵世瑜，1959年8月生，1982年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出版专著《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袞全传》（合著，1986）、《史与中国的传统社会》（1994）、《眼光向下的革命》（1999）等八部。译著《欧洲史学新方向》等三部。论文八十余篇，重点研究16世纪以来的基层社会、民间文化。现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明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理论》、《史学月刊》、《民俗研究》等刊物的编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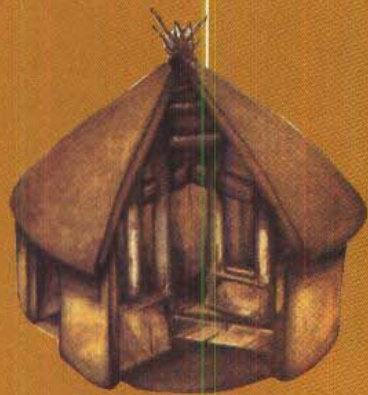
李少兵，1969年7月生。1995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兼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学术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社会史。

目前学术研究方向为现代中西宗教文化、风俗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已在《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民国时期的佛学与科学思潮》、《五四时期新村主义新探》等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并出版《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等著作。

目 录

中国历史
飘逝的岁月



前 言 / 4

第一章 混沌初开 / 6 (史前社会)

- 一、石器时代先民的聚落与生业 / 7
- 二、从兄妹相婚到生殖崇拜 / 11
- 三、原始人类的思维世界 / 16
- 四、传说中的三皇与五帝 / 20

第二章 钟鸣鼎食，尊卑有序 / 24 (夏、商、周三代)

- 一、三代政治制度架构的演进 / 24
- 二、公侯、众庶及臣隶妾 / 30
- 三、龟甲和铜器上的刻铸文字 / 34
- 四、在废墟中寻觅
——三代社会的“天、地、人” / 38

第三章 天崩地裂的社会变动 / 44 (春秋战国时代)

- 一、从尊王攘夷到问鼎天下 / 44
- 二、最活跃的社会集团
——士人 / 48
- 三、科技与商贸的勃兴 / 52
- 四、千里不同风，百里有异俗 / 58

第四章 浑金璞玉大一统 / 62 (秦汉王朝)

- 一、一个好大喜功的时代 / 63

- 二、宦者、游侠与邯郸倡 /68
- 三、秦汉之世畏鬼神 /75
- 四、美食美器 /82
- 五、强宗大姓和田庄经济 /90

第五章 除旧布新的时代 /94 (魏晋南北朝)

- 一、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 /94
- 二、佛陀东来与道教立规 /98
- 三、胡风汉雨中的北朝 /104
- 四、吴蜀民风的变迁 /108
- 五、士人生活面面观 /112

第六章 流金岁月 /116 (隋唐时代)

- 一、“四夷可使如一家” /116
- 二、村社与都会 /123
- 三、科举制度下的士子们 /129
- 四、唐人喜游乐 /132

第七章 仕宦、市民、世俗的世界 /138 (北宋与南宋)

- 一、唐宋之际：又一个变革期 /140
- 二、新的社会主宰：从文人到文官 /143
- 三、都市生活的喧嚣：“直把杭州作汴州” 150
- 四、文人意趣与民众文化的二重奏 /157

第八章 马上治天下 /164 (从辽、夏、金到元朝大帝国)

- 一、寒冷期与接二连三的“南下牧马”潮 /164
- 二、汉化与胡化 /172

- 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与四等人 /178
- 四、世界性大帝国及其崩解 /185

第九章 最后的帝国，变动的时代 /188 (明 清)

- 一、“各安其位”：秩序重建与正统重塑 /189
- 二、正、嘉风气之变与明朝之际的“天崩地解” 196
- 三、地方化、民间化与早期城市化 /201
- 四、西风东渐：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209

第十章 风云激荡 /218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

- 一、世纪初的社会变迁 /218
- 二、社会改造蓝图与实践 /221
- 三、新旧交替的社会实况 /227
- 四、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239

参考文献 / 244



前言



试图描述和解释人类的过去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对中国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度的历史加以描述和解释，自然是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对历史给予客观的描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重要的中介——史料往往是残缺不全的，有许多文献是经过窜改的，有些虽标榜“秉笔直书”，但还是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许多主观因素，因此，对历史给予客观的描述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史料批判。其次，对历史的简单描述并不能使历史学家满足，他们希望多问几个为什么，他们希望探询历史表象背后的意义，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对已能有所描述的那部分历史进行解释。由于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面对的问题不同、学术素养不同、眼界不同以及可凭依的研究工具不同，所以使得人们对同一个历史现象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实际上，这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是它永久的生命力和代代常新之力量所在。

正像过去许多代人热衷于政治史、热衷于铺陈和解释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人物一样，今天的人们对于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也是因为他们所要思考的问题较之以前复杂了，因此对历史的解释也就有了新的角度。由于问题意识和解释角度的变化，许多原来不被视为史料的东西——包括文字和实物——也就被纳入了学者的眼帘。原来被当作中药“龙骨”的甲骨，引起了20世纪初殷商研究的革命；像废纸一样到处遗弃的文书档案，由于“八千麻

袋”明清档案的引人注目而重新被人珍视，包括各种地方政府档案等，成为研究制度史的重要文献，而以徽州文书为代表的民间书契，开始成为研究区域社会的宝贵财富。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思考的路线是多元的。我们可以从研究精英活动的历史走向研究大众的历史，再走向“自下而上”进行的历史，最后走向整体的或综合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借助社会科学和其他人文科学展示的研究领域、理论和方法把“社会”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改造和丰富我们的研究；我们提供的多种研究成果，会为友邻学科的本土研究提供历史学的经验。我们的所谓“社会史”，就是走在这一个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向社会展示我们新的尝试、新的探索，让他们感受到历史学的活力，而这后一点，正是我们写作这部插图本《中国社会史》的目的。

本书虽然挂一漏万，但还是试图有重点地勾画从史前到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其中又以社会变迁、社

会构成和社会生活这三个方面为叙述的主要内容。有些方面是以往的历史书讲得不多的，有的是与以前讲得有些不同的，因为体例的需要，有些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尽量展开；有些展开了，但只是一个局部；有些必须采取轻松可读的写法，取代了学术著作应有的凝重，目的是使读者感受到一点清新的气息。较多的插图并不能简单视为取悦读者，甚至媚俗的商业性做法，而应视为加深理解所述历史的工具，视为史料，视为无言地讲述自身历史的老人。读者如能这样理解“插图”的意义，才能真正做到开卷有益。

本书写作的分工是这样的：曹文柱撰写本书的第1—6章，赵世瑜撰写第7—9章，李少兵撰写了第10章的初稿。前言由赵世瑜撰写，曹文柱对个别文字进行了一些修改。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石瑄、宋兆麟负责为本书提供图片。此外，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黄燕生为图片搜集提供了帮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丽菲、夏玮为此书的编辑出版劳神费力，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赵世瑜



混沌初开

史前社会

两千多年前，楚国大诗人屈原举目向苍天：“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天问》）其实这些问题，就是今天，谁人又能说清楚了几分？宇宙之谜，固然难于解析，至于人类社会，我们何尝不是也知之甚少呢？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只有几千年，此前则是漫漫的蒙昧和野蛮时代。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缺乏，我们能够探索到的答案，实在是少得可怜。

汉画像石中的
神农氏形象

这个以“耕而作陶”称著的传说人物，是新石器时代农耕生业方式的缩影。



一、石器时代先民的聚落与生业

距今300万年前新生代第四纪的造山运动，奠定了中国大陆相对封闭、西高东低的地貌特征。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这时正处于人、猿分途进化的阶段。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陆续出土的大量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粗疏地显现了我们祖先由蒙昧、野蛮向文明演进的轨迹。目前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当属距今170万年左右的云南元谋人。紧接其后的有重庆巫山人，陕西兰田人，湖北郧县人，北京人，河南南召人，安徽和县人，辽宁金牛山人，以及稍晚的山西许家窑人、丁村人，广东马坝人，广西柳江人，台湾左镇人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等等。总之，从远古到1万年左右，东南西北中，到处都散落着古人类活动的足迹。但是，以打制为主、类型简单的旧石器，限制了先民利用与开发自然的能力。在采集和渔猎的生业方式下，度日艰辛，可以想见。先民生存面貌的重大变化，是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农耕生业方式的出现而开始的。

大致在1万年以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上的聚落形态不断蔓延是这个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到4000年前左右结束，前后持续了约五六千年之久，已发现的文化遗址约有7000多处，正式发掘的有100多处。按照时间顺序，新石器时代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在距今10000—7000年之间是早期；距今7000—5000年之间是中期；距今5000—4000年之间为晚期。按照地域，又可划分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上游地区、下游地区，长江流域的中游地区、下游地区，东北地区，华南地区等7个区域。如果将这7个区域分别对应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其代表性的文化，早期依次为：①裴李岗·磁山文化，②老官台文化，③北辛文化，④彭头山文化，*⑥前红山文化，⑦落笔洞文化。中期依次为：

①仰韶文化，②马家窑文化，③大汶口文化，④大溪·屈家岭文化，⑤河姆渡·马家浜文化，⑥红山文化。晚期依次为：①河南龙山文化，②陕西龙山文化·齐家文化，③山东龙山文化，④石家河文化，⑤良渚文化，⑥小河沿文化，⑦石峡文化。上述这一对应并不十分准确，而且有缺项，但毕竟是从纷杂的文化类型中，梳理出来的一条大致可辨的历史线索。

早在新石器早期，农耕聚落就已形成。河北武安磁山聚落遗址面



石器和石镰 分别出土于红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



积有8万平方米，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面积竟达12万平方米。内蒙古东部敖汉旗兴隆洼聚落有整齐有序的半地穴式房址120多座。仰韶文化是尚未分化的农村聚落发展最充分的时期。陕西临潼姜寨聚落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聚落有居住区、窑场和墓地三类遗存。居住区位于中央位置，外环以深沟，防止野兽侵扰。居住区内同时存着的100座左右圆形半地穴房屋，被分成5个大的群落。其中心部位是一个1400多平方米的广场，构成一个共同活动的神圣的空间。各群房屋的门均朝向中央广场，呈现圆形、向心、内聚的布局。其他同时期的聚落遗址，情况相似，只不过

*⑤项为正常空缺，早期在长江下游尚无重大考古发现。

南方因潮湿采用的是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有的学者指出，只要地理条件、地形环境允许，这种内聚式的环形向心布局便成为史前聚落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典型规划。它体现了这时期的聚落精神和尚未分化的组织结构，是聚落团结与内聚力极强的标志。这些聚落遗址都曾若是若干大家族组成的氏族居住地，因而环形向心布局所呈现出的团结和内聚，是同一氏族内各家族之间的团结，是氏族层次、氏族结构的内聚。墓地的形制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合葬墓占70%，一穴10—20人，有的多达70人，没有发现夫妻合葬墓。合葬墓的遗骨为二次葬，是将死亡不同时间的亲属集葬在一起的。这表明氏族组织内部结构牢固，成员生前死后都不能脱离亲属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发生很大变化。龙山文化墓葬中男女合葬墓、单人墓增多，公共墓地规模比以前大为缩小。居住区的房址冲破了整齐划一的格局，房屋面积变小，反映了个体家庭日益从氏族中独立出来的倾向。贫富分化的现象也从墓主人随葬

品的多寡反映出来。黄河中游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中的大墓主人，使用彩绘木棺，随葬品不但数量多达百余件，而且制造精美，有彩绘木器、陶器、玉器及各种装饰品、乐器和礼器。而同一茔域的小型墓，只有少数有1—3件简陋随葬品，大部分则一无所有。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晚期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城邑的雏形。山东龙山文化城子崖城址面积18万平方米左右。

支撑史前聚落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原始农业。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南方和北方农业结构在新石器时代已显露地域的差别。磁山遗址发现88座储存粟的窖穴。学者根据存粮厚度统计，仅磁山一期粟的产量即在8万公斤左右。半坡遗址中的一些瓮和室内小窖也有粟的遗存，多者一处可达数斗。南方地区则存在着稻作农业的遗物。在河姆渡聚落，4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储存于仓库的大量稻谷、稻秆、稻叶堆积物，最厚处达0.8米。换算成新鲜稻谷，当在10万公斤以上。磁山和河姆渡两处遗址粮食的储存量，足以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无论南北，较为稳定的农业经济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依赖于农业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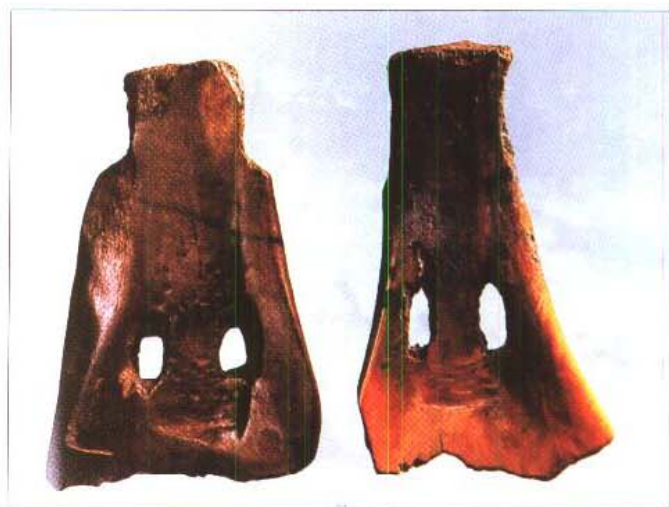
仰韶文化时期的
贮谷罐和石磨盘



管理技术的掌握和各种农具的发明。黄河流域疏松的黄土和南方质地紧密的红壤不同，所以耕作工具也有不同，在北方发现的多是利于掘土翻地的石铲。早期的石铲比较粗糙，到龙山时代，不但磨制得十分锋利，而且在铲体上部钻出圆孔，以便装柄时绑扎。而南方出土的农具主要为骨耜、石犁和破土及耘田的一些石器，这些农具都是适应水田耕作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除石器、骨器外，还有木器、陶器等多种。出土的各类农具数量也很大，仅河姆渡遗址就发掘出农具近 3000 件，其中骨耜 170 件。许多工具采用复合形式，如装木柄的石铲、石斧、骨镰、蚌镰和鹿骨镞等。在一些出土的陶器上，经常能够见到绘有经过捆扎组合的工具图像，可见这类农具使用之普遍。龙山文化时期，无论在黄河中下游诸文化遗址，还是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区，都发现有人工开凿的水井。凿井技术的发明，使农业聚落分布不再受缘河而居的限制，既扩展了先民活动的空间，也增加了聚落的稳定性。

家畜饲养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我国传统的六畜即马、牛、羊、鸡、犬、猪，在各地的家畜中大都俱全，其中以猪的数量最巨。家畜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是显示财富的标志。泰安大汶口遗址的 43 座墓中有随葬的猪头 96 个，胶县三里河遗址一座墓中有随葬猪下颌骨 32 块。城子崖遗址中马骨的数量仅次于猪、狗。另外渔猎也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各地陆续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渔猎工具和猎获物遗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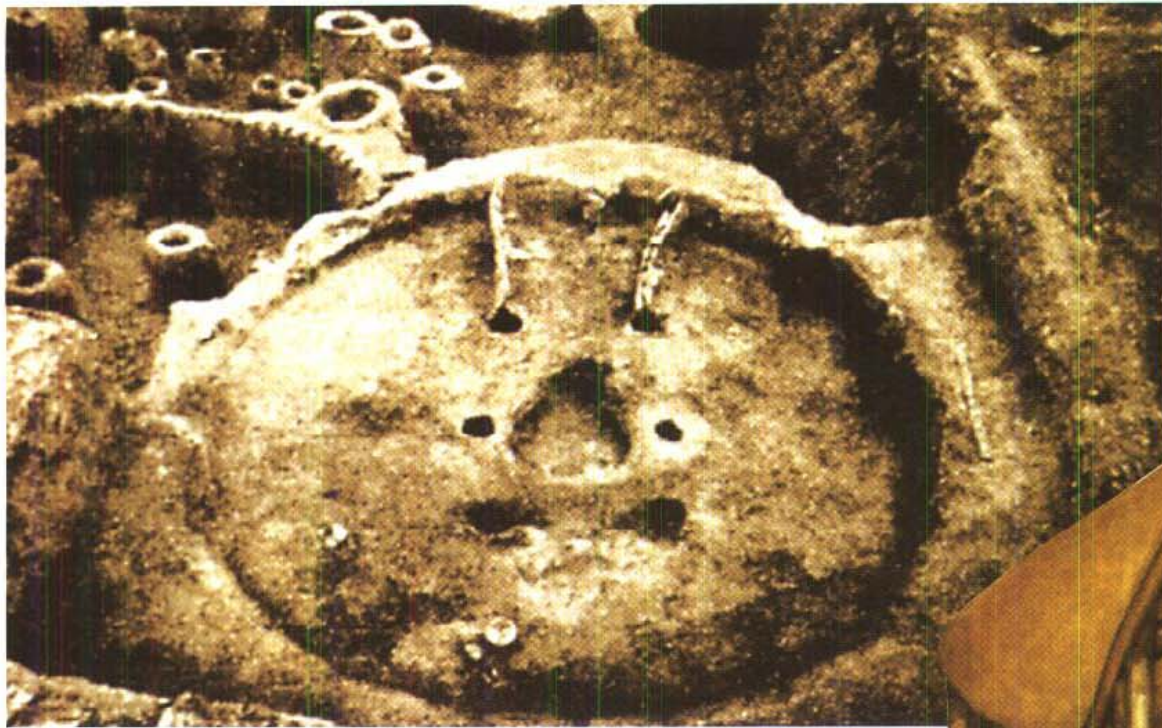
制陶业是当时手工业的强项。在新石器的早期和中期，制坯的方法主要是泥条盘筑，窑炉也是敞口，因而陶器的造型和烧制质量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即使这样，仰韶时期的彩陶仍颇有特色。到龙山文化时期，由于普遍采用快轮拉坯，不仅速度增快，而且坯体薄厚均匀，器形精整。此外，对于复杂的器物，人们还使用轮制、手制结合的工



用动物的骨骼
和角制造农具
这也是石器时
代先民的一大发明。

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鸡





半坡遗址与复原图



艺，使器皿更加美观和实用。黑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作，其质地坚硬、陶色纯正，有的薄如蛋壳，厚度仅有0.3毫米，并外刻纤细精致的花纹和缕孔。木工技术是个逐渐提高的过程。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大量榫卯木构件，纠正了只有金属工具产生才可能有榫卯的成说。龙山文化时期，木器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山西陶寺遗址保存了一批彩绘木器，种类有案、俎、几、匣、盘、豆、斗、勺、杯和鼓等。这些器物或者方正规矩，棱角分明；或者弧度适中，均匀对称。所有器具漆色五彩纷呈，图案庄重神秘，十分精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随葬了系列配套的木工工具石锛、石斧等。仅石锛就有13件，长宽大小各异，刃部宽度依次递减，型号齐全。玉器制造和牙雕、骨雕技术也令人叹为观止。大汶口文化有透雕或镶嵌绿松石的骨筒和象牙筒。良渚文化更以玉雕闻名于世。其技法有镂孔透雕、浮雕和阴线雕刻三大类。有的浮雕凸面呈现几个不同层次的平面，有的为雕刻繁密图像还使用了主体纹、地纹和装饰纹的三重装饰。从陶器印痕上的

布纹看，至少在仰韶文化时期先民已发明了水平式织机，懂得了人字纹、辫状纹、条带式多种织法。到龙山文化时期纺织技术进一步提高，麻布的密度从仰韶时期的每平方厘米 6×9 根，发展到 20×30 根，而且还发现了丝织器，说明时人已掌握养蚕缫丝织布的技术。

手工业需要长时间的技能培训和数代人的经验积累，于是个别家族脱离农业而专门从事手工业劳作成为可能。手工业从农耕生产方式中产生，又逐渐与之分离，终于演化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这一变化在我国大致可以断定是萌发于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杯



二、从兄妹相婚到生殖崇拜

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一直进行着两种类型的生产活动：一种是维系个体生命生存的物质资料生产；一种是使种群得以延续的人口生产。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中国古人认识到两种生产缺一不可的道理，故而很早就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提法。

当然，最早的原始人类并不明于此。那时两性的交媾，更多的是出于动物的本能，而不是为繁衍后代。人类学家根据“北京直立人”（北京猿人）头骨上的伤痕分析，认为这是雄性间为争夺与雌性交配权，进行斗殴所致。（参见谢苗诺夫《婚姻与家庭的起源》）有的医学史家也推测：“最早的刚由猿进化而来的人只怕仍如动物那样有发情期。牛郎织女的一年一度七夕相会，是否是一种原始人类发情期残存现象的遗留。”（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70页）所以人类最初的两性关系与动物毫无二致，处在所谓“男女杂游”、“无上下长幼之道”（《吕氏春秋·恃君览》）的杂乱状态。

两性关系随着人类生产活动和智力发展，逐渐由“无禁忌”、“非规范”的阶段，演进到“有规范”的婚姻时代。婚姻作为两性关系的社会形式，历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的婚姻仅指制度化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婚姻。而广义的婚姻则把一夫一妻制婚姻出现以前的原始婚姻也包括在内。

两性关系的最初规范是首先排除了不同辈分人的乱交，血缘内婚出现。由于年代久远，我们无法找到直接证据，但可以从神话传说中发现一些社会遗留下来的残片。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伏羲（牺）、女娲兄妹相婚的故事。唐人李亢在《独异志》中记载此事最详：“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两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

面。”《路史·后记二》注引《风俗通义》明确讲：“女娲，伏羲（牺）之妹。”伏羲和女娲，在众多古文献和民间传说中，皆被推崇为“人祖”。汉武梁祠石室画像，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石刻以及隋高昌故址、吐鲁番古墓出土的彩色绢画都有伏羲、女娲交媾的内容。在这些图画中，伏羲、女娲皆被描绘成人头蛇尾，两尾相交的形象，表明这一对兄妹存在着夫妻关系。

原始婚姻形态依次递进的过程，表现为婚姻禁忌范围的不断增加。原始族团不断增生与频繁交往，使得血缘内婚向血缘外婚过渡成为不可避免。两种婚制最大的不同是，在一定范围内排除了直系血亲间的两性交媾。取而代之的是不同血缘族团两性之间不稳定的婚配关系。血缘外婚又称两合氏族群婚制，即两个氏族之间的男女互为群婚配偶。这种婚制在古代汉语中保留了不少遗



人头蛇尾

两尾相交的伏羲与女娲。这是血缘内婚在神话传说中的反映。



石器时代的玉雕

“人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女性受到普遍的尊重。

迹。《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兄弟之子为侄。”就是说，本氏族女子所生之男，要“出”本氏族与另一氏族之女婚配；另一氏族之女所生之男，则返“侄”本氏族进行匹配。同书还称：“母之舅弟为舅”，“父之姊妹为姑”，“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则是讲，男性对舅父、岳父与姑母、岳母的称呼；女性对舅父、公公与姑母、婆母的称呼，在名目上皆无不同。这充分显示了两氏族存在着对等的群婚关系。另外的例证是“出”之子，生于外氏族，被称为“离孙”；而“侄”之子，生于本氏族，遂有“归孙”之名。这时的男子必须游走于外氏族，所以“人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白虎通》），人们世系只能以母系计算。

前述仰韶文化时期的姜寨遗址，为我们提供了血缘外婚类型社会的生活场景。与姜寨属于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址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很多。这些遗址的氏族墓地共同特征是，只有男女分葬墓、同性合葬墓和多人合葬墓，而无夫妻合葬墓。多人合葬墓的男女不成比例，印证了本氏族中女子的“男伴”和男子的“女伴”都不包括在内。因为男女人数多少完全受自然规律支配，没有因缔结婚姻而得到调整。从成年男子和成年女子的单人墓看，女性墓主人殉葬品一般要比男性多，且器物精美。女性儿童享受厚葬和成人葬习待遇。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组织中女子地位普遍优于男子的情况。但是母系并非等于女权，仰韶文化时期氏族首领的男性比例很大。河南濮阳西水坡母系氏族社会遗址墓地发现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其中间是一壮年男性骨架，显示墓主

人生前具有特殊地位。有的学者推测，血缘外婚最初当属“野合而婚”。四川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有一幅男女交媾图，其背景并非房屋床帐，而是山水树石，即是典型的“野合”图景。叔梁纥“野合”而生孔子，大约就是这种古风在春秋时期的孑遗。继“野合”之后，便是以女方氏族为居住地的集体走婚制。姜寨聚落的半地穴房屋，也可视为走婚男女的会合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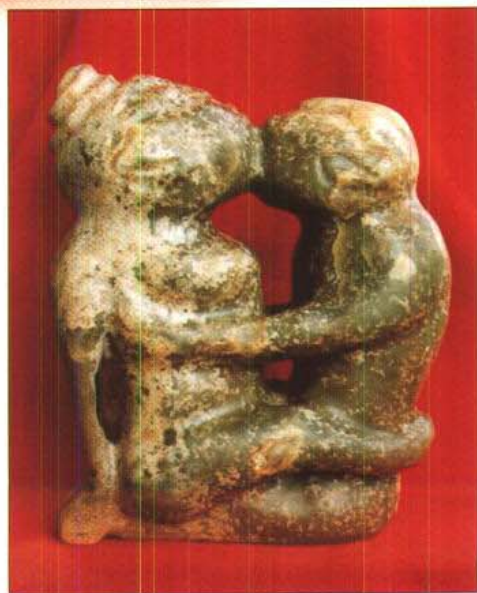
在由血缘外婚向一夫一妻制婚姻过渡期间，还曾经出现过对偶婚。这是由于婚姻禁忌日益错综复杂，两性关系的范围不断缩小，原先一群男女的结合，逐渐减缩到只剩一男一女，形成了不牢固的对偶结合。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剩余财产的扩大，男子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日趋加强，必然导致以男系计算血缘关系的个体婚最终形成。龙山文化一夫一妻制婚姻已成为主要的婚姻形态。不过，这一转化并非一帆风顺。消除以母系为主的传统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流传于世界各地的“产翁制”，在中国也曾存在。《太平广记》引唐人尉迟枢《南楚新闻》称：“南方有僚，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又说：“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食抱雏，坐于寝榻，称之产翁。”这是男子向女子争夺对子女“拥有权”的一种象征性举动。个体婚制的确立，意味着男性对女性不平等的产生。齐家文化有为数不少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常见的葬式为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肢并面向男子。皇娘娘台遗址的一男二女合葬墓，也是男子居中仰卧，两女子侧身俯贴于男子左右。两地墓葬的情况表明婚制的变化对男女社会地位的升降有着重要影响。

人类关注人口生产奥秘，大约从对两性关系进行最初规范时就开始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任何人都孕育于母腹，产生于母体阴道。生命从无到有，无不缘于女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先民的生殖崇拜，首先表

现在对女性崇拜和对女性生育部位崇拜，也毫无奇怪了。近年在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两件陶塑女像。两像皆为裸体孕妇，乳房突出，阴部有记号，显然是为祈求生育而制作的女神像。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裸体人像壶上有逼真的女阴造像。其壶体膨大，更是怀孕的象征。



一组石器时代的男女交媾玉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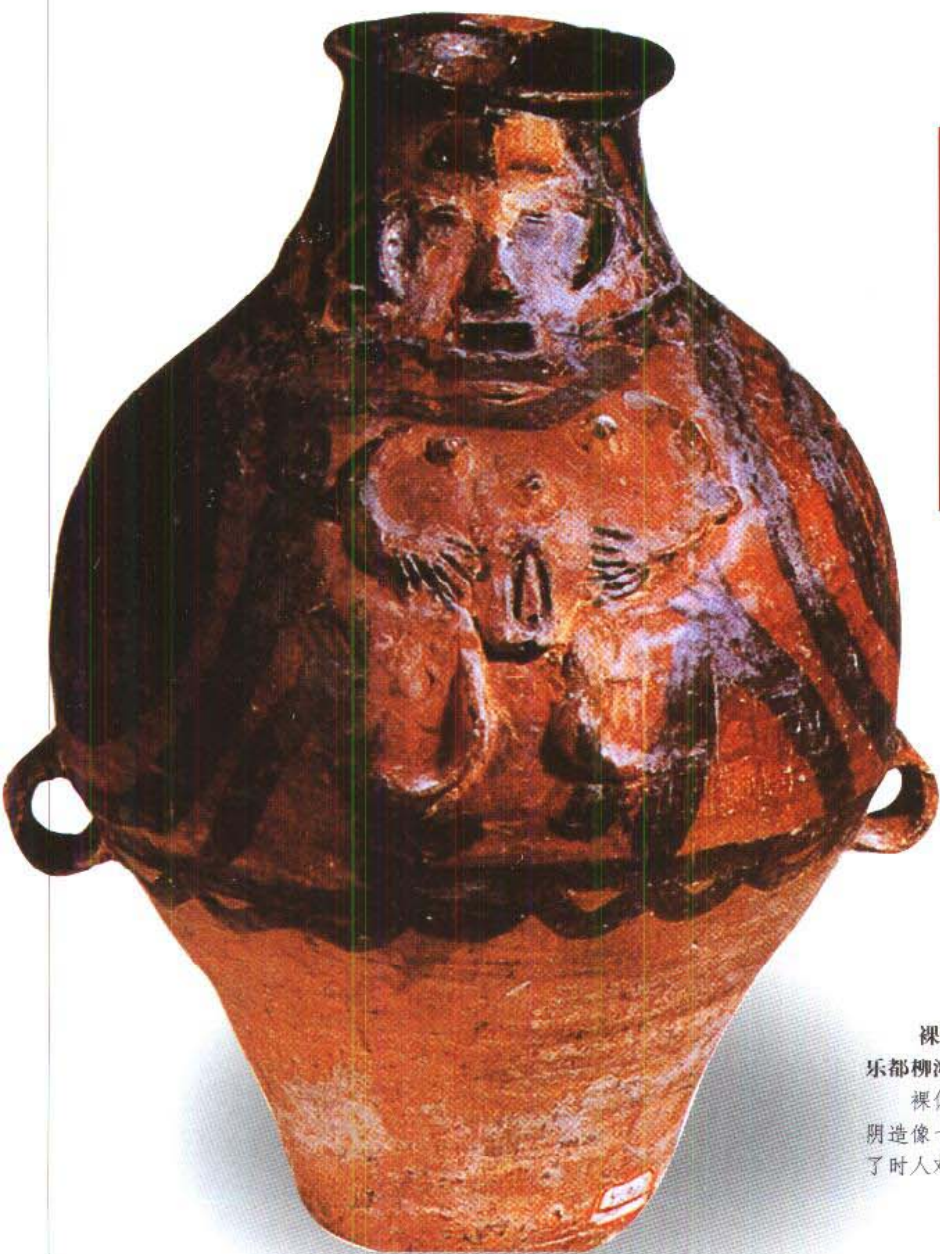
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经常可以见到鱼纹、蛙纹的形象。有的学者认为，鱼、蛙轮廓与女阴相仿，鱼繁殖力强，蛙腹体形酷似孕腹，两种形象皆是女性崇拜的体现。

随着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先后出现，人们对生命的诞生与两性结合的关系有了直觉的认识。于是，性交崇拜和男根崇拜逐渐兴起。西藏任姆栋1号岩画和新疆呼图壁岩画，都有男女交媾的场面。岩画中两性生殖器都刻画得非常形象，还特意对男根做了夸张。

内蒙古乌兰察布岩画，除有女性裸体舞、孕妇舞外，又有男女裸体恋爱舞。阴山岩画中也有表现两性性器官和两性交媾的画面。直接以男根为造型的崇拜物，被称作

“祖”。甲骨文和金文将“祖”字都写作“且”状，是个男根的象形字。目前在许多原始社会时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陶祖和石祖。例如陕西省的铜川李家沟、华县泉护村、西安客省庄等处遗址；河南省的淅川下王岗、信阳三里店、郑州二里岗等处遗址；甘肃省的甘谷灰地儿、临夏张家嘴等处遗址；湖北省的屈家岭、关庙山等处遗址；湖南省的安乡度家岗以及广西坛楼、石产等处遗址。此外在山东潍坊鲁家口、山西万泉荆村以及新疆罗布淖尔等处遗址也有发现。时间大多属于龙山文化时期。

原始社会产生的生殖崇拜对后世影响很深。牟钟鉴先生在《中国宗教通史》中甚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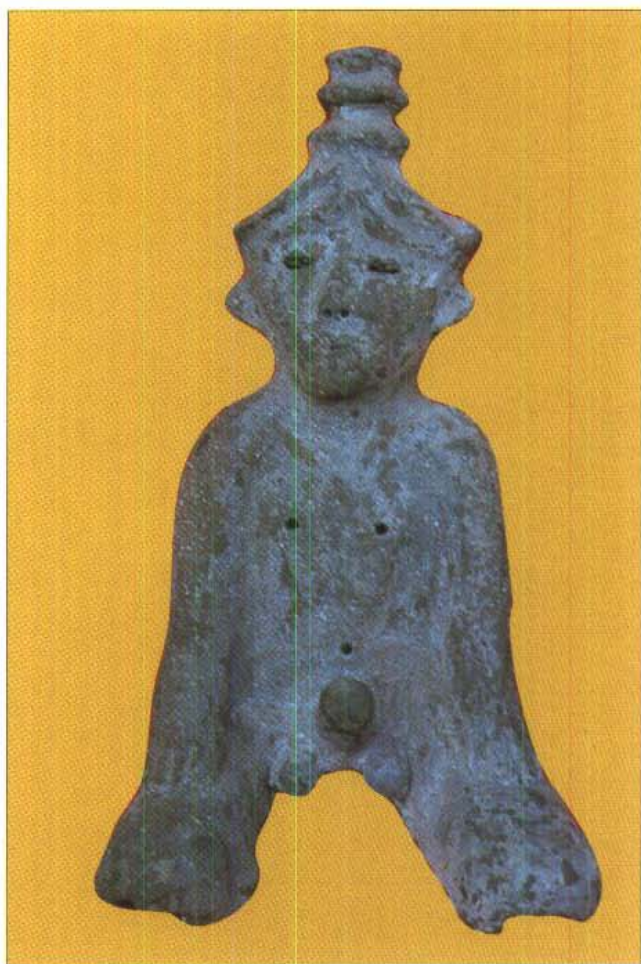
两枚玉祖

这是男根崇拜观念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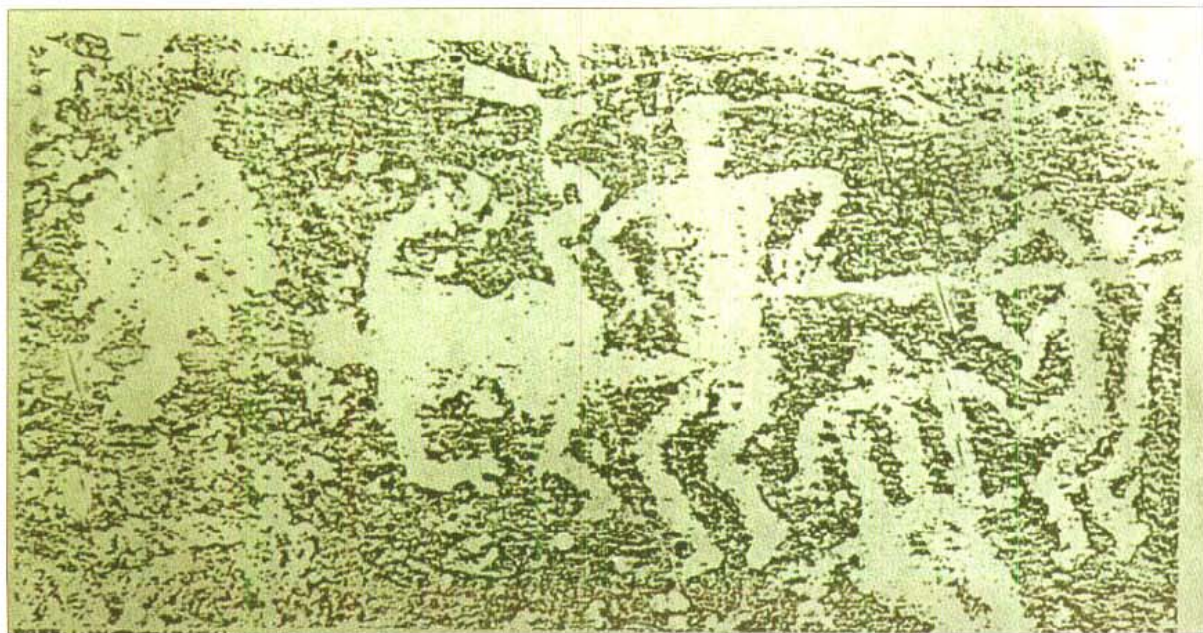
裸体人像壶 青海乐都柳湾出土

裸体人像壶上的女阴造像十分逼真，反映了时人对女性的崇拜。

提出了如下认识：先秦道、儒两大显学，其文化源头都可追溯到生殖崇拜上来。老子把“谷神”、“玄牝”象征母体和女阴的词汇，用来解释作为万物本源“道”的含义。他阐述的原初大道则是一个虚空的母体，渊兮万物之宗。恍惚之中有物有象，天地万物渐次而生。《老子》一书反复地用女性生殖原理和母子关系讲说大道与万物的关系。“道”实际上就是女性生殖功能的扩大。道家主阴贵柔，更与女性崇拜一脉相承。而儒家敬祖讲孝，崇尚的是男性在家族血脉中的关键作用。敬祖当属男根崇拜，讲孝在于强调父子关系。儒家还移家为国，移孝作忠，使君臣关系成为父子关系的扩大，夫妇关系不过是为了父子关系而准备的条件。倡导阳刚之气、进取精神的儒学具有强烈的男性生殖文化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互补，哲学中的阴阳二元一体，即是对两种生殖文化的吸纳，又是对两者的综合提炼。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人



平罗交合岩画中的人物形象

与上图中陶人一样，都对男根做了夸张。